

重读“马歇尔冲突”

——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梳理

□ 张日波

内容提要 马歇尔冲突,即规模经济和竞争之间的矛盾,是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学界的难题。学界一般认为在马歇尔的体系中,规模经济与竞争之间是冲突的。本文通过区分马歇尔经济学与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系统的经济思想史考察。通过回到马歇尔的语境中,考察“规模经济”和“竞争”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可以发现在马歇尔那里,两者是可以兼容的。马歇尔冲突事实上是后来的新古典体系中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冲突。马歇尔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对实践和经济学下一步的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关键词 马歇尔冲突 完全竞争 规模经济 垄断 报酬递增

作者张日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学教研部讲师。(杭州 310012)

自2007年经济危机以来,国进民退问题似乎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2008年底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巨额资金流向了国企,被“铁公基”等行业占用。很多低效的项目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也为银行增加了信贷风险,另外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几年中饱受通胀之苦。国企虽然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长久以来亦为国人所诟病。在人们抱怨国企效率低下、价格垄断、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等一系列问题的背后,需要反思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基础。对该问题,学者们莫衷一是,观点很多,可以归纳为意识形态论和弥补市场失灵论两种解释。撇开意识形态层面不谈,市场失灵论的一种解释是:很多行业存在报酬递增、规模经济现象,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产生垄断,这不利于市场竞争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存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与竞争之间的两难冲突,即后人所说的马歇尔冲突。为了既

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又不损害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由国家以国有企业的形式代为经营这些行业便顺理成章。这就是“市场失灵”论对国有企业存在合法性的解释逻辑。然而,在理论层面上,学界对于马歇尔冲突这一如此重要的命题,却在过去的—个多世纪中争论不休。因而重读该命题有其必要性。

一、文献综述

围绕马歇尔冲突最初的,也是最激烈的争论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于报酬递增问题的大争论。有关这一主题的后期研究文献,可参考Wolfe(1954),Davies(1955),Hague(1958),Maxwell(1958),Hollander(1961),Loasby(1978),Moss(1984),Aslanbeigui(1996),Hartley(1996)等人的研究。尽管这场争论没有明确地提出马歇尔冲突这一术语,但从争论的核心内容来看,这场争论可以认为是该问题的源头。该辩论的参与者

包括:杨格、庇古、罗宾斯、斯拉法、熊彼特、哈罗德、肖夫、罗伯特森等著名经济学家。在这场争论中,有关规模经济和竞争在马歇尔经济学中的关系,大致分为两派观点:矛盾派和相容派。矛盾派的代表是斯拉法(1926),罗宾斯(1928),庇古(1928)等人。斯拉法认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依赖于“完全竞争”和“其他条件不变”两大假设,而马歇尔所提出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分别与这两大假设冲突。因为内部经济必然导致垄断,这就与完全竞争的假设冲突;外部经济则意味着不同部门之间的互相影响,这就难以保证“其他条件不变”假设的成立。庇古虽然是马歇尔的接班人,但他也认可斯拉法的观点,认为内部经济会导致垄断。相容派的代表是杨格(1928),罗伯特森(1930)等人。杨格认为马歇尔对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区分能够实现报酬递增与竞争的相容。Robertson强调了马歇尔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这是在马歇尔的体系中报酬递增和竞争能够相容的关键。事实上矛盾派的观点偏离了马歇尔的本意,这一偏离为 Shove(1942),萨缪尔森(1961),Loasby(1978),Hart(2003)等学者所注意。不过正如后来的学者所指出的,在这场争论中,反对派的阵容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对后世经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自这场争论之后,学界一般认可了在马歇尔语境中马歇尔冲突的存在性。

例如,施蒂格勒(1951)认为,马歇尔的理论中的个别厂商所面临的销售困难,不符合严格定义的完全竞争的概念。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Vassilakis(1987),Whitaker(1987)也认为存在着马歇尔冲突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现象。有些学者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认可在马歇尔语境中存在马歇尔冲突,而且还试图构建新的理论来化解这一冲突,典型的代表是 Clark(1940),Baumol(1982),王瑶(2011)等人。Clark认为马歇尔冲突是可以化解的,他针对完全竞争概念的非现实性,提出了“有效竞争”(workable competition)的概念。所谓有效竞争,就是既有利于维护竞争又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竞争。他认为多样化的竞争手段可以解决马歇尔冲突。Baumol等人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contestable markets),该理论认为,市场进出自由形成的潜在

竞争压力会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从而会消除垄断对效率的影响。中国学者王瑶(2011)提出了检验马歇尔冲突的两个标准:第一,规模经济是否构成进入壁垒;第二,规模经济是否实现了经济效率。他认为只要将 Stigler 假说(规模经济不构成进入壁垒)和 Baumol 的可竞争市场理论结合起来,就可以证明马歇尔冲突是一个伪命题。

以上诸观点事实上隐含地认为,马歇尔语境中的“规模经济”、“竞争”概念与后来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完全竞争”概念是同义的,因此这些观点有将马歇尔经济学与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相等同的倾向。然而,马歇尔的很多核心概念,甚至研究的基本假设,都与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的不同。今天的很多经济学家由于不了解经济思想演进的历史语境,不了解这种重要的差别,导致了对马歇尔理论的严重误读。

本文立足于经济思想的发展,使用文本解读的方法,通过对马歇尔体系中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竞争、完全竞争这几个概念的分析,对马歇尔冲突进行了重新解读。以此为基础,本文为马歇尔体系做了一定的辩护,并指出了马歇尔冲突产生的实质。以下拟从四方面展开:首先,解读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其次,介绍马歇尔的竞争概念;第三,指出规模经济与竞争关系的演变;最后是结论和展望。

二、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

对马歇尔冲突的理解必须首先准确把握马歇尔的“规模经济”的内涵。在《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中,马歇尔只是两次提到“规模经济”,七次提到“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他更多地使用“报酬递增”这一术语。马歇尔的语境下,“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和“报酬递增”几乎是等价的,而且其含义与后来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规模经济”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以下重点分析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

(一) 报酬递增与组织的经济

马歇尔时代的经济学较少使用数学,这与现代形式化的经济学不同。他虽因局部均衡分析而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却一再强调局部均衡分析在处理报酬递增问题上的局限性。表面看来,他对报酬递增的论述基本上是纯粹的文字描

述,事实上隐含在这些平实的文字背后的,是他生物演化分析的尝试。在十九世纪,生物学演化思想很流行,其影响非常广泛,即便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作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马歇尔的思想受到了该思潮的影响。1867年,他声称读完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歇尔的夫人曾提到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时,马歇尔曾随身带着斯宾塞的《第一原理》。^①

马歇尔对报酬递增的定义是“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②他认为社会组织与生物组织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的。每一部分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少,而为了它的福利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部分……”。^③马歇尔认为工业组织也是一种有机体,其发展也表现在同样两个方面,他指出“这种机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称为‘分化’,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一体化’……表现为商业信用的保障之增大,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报、邮政和印刷机等交通工具和习惯的增加等形式”。^④

可见,报酬递增即组织的经济、组织的改进。组织的改进由“分化”和“一体化”两方面构成。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并发展的。当组织一体化深化时,组织分化也必然在深化,这是组织演进的关键所在。这部分的论述是马歇尔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之处,也是马歇尔将生物演化思想融入经济学的体现。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报酬递增就是分工的经济。斯密认为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三个方面: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分工节约了工作转换的时间;分工导致了机器的发明。马歇尔也承认分工导致报酬递增,但分工只是组织“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而只是报酬递增的一个方面。

(二) 报酬递增与内、外部经济

由马歇尔对报酬递增的分析可知,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所带来的,事实上是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产生的效率提高,但这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有所区别,因为这里的“生产规模的扩大”所

带来的经济分为两类:一种是外部规模经济,一种是内部规模经济。后者类似于今天的规模经济。马歇尔指出,任何一种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⑤联系他对组织分化、一体化的论述,我们发现内部经济类似于组织的分化,外部经济类似于组织一体化。所以报酬递增即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它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类,前者对应于产业组织的分化,后者对应于产业组织的一体化。

外部规模经济是外在于个别企业的经济,“是由于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达而产生的,这些部门互相帮助,也许集中在同一地方,……它们都利用轮船、火车、电报、印刷机等所提供的近代交通便利”^⑥,这种好处不是完全依靠个别企业的,是非排他的,所以任何企业都可以获得,这样的规模经济也不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可见,外部经济不仅来自于同一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来自于产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概言之,它来自于“交互作用”。定域化(localization)是外部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这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定域化有利于无形资产的充分使用和创造。他指出集聚使“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⑦“行业的秘密”、“技术”、“思想”这些可以视为无形资产。当一种无形资产对人们有益的时候,毫无疑问,对它越充分、越多地使用越会增进人类的福利。无形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排他、非竞争性的,这是集聚利于外部规模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集聚使得这些无形资产得以广泛地传播、使用和创造,进而会不断地转化成生产上的经济,甚至会成为区域竞争力的源头所在。第二,定域化利于辅助行业的产生。产业的集聚往往使产量增大,这必然会使昂贵的机械得到充分使用,由于有很大的市场,辅助行业也就应运而生。第三,定域化使专业技能市场得以维持。可以发现,马歇尔的这些观点和斯密定理是一致的。所以马歇尔的论述又有明显的古典经济学特色。

内部规模经济是否会无限发展,从而导致个别企业的垄断?马歇尔的答案是否定的。早在《经济学原理》问世20年前,他就形成了这种观点。在1870年的手稿中,他指出,小企业被一个或几个大企业所取代的现象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其理由有两点:首先,因为树木因树龄的限制而会有盛衰,所以较高的树木会逐渐失去生命力,相继地让位于较小,但活力较强的其他树木。类似地,个别企业也不可能一直存续。因为企业创办人的寿命是有限制的,其继承者往往不具备创办人的诸多才能,这使得该企业不能持续维持之前的内部经济优势。这就是马歇尔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这里再一次体现了其演化思想。其次,企业受规模经济的驱使而扩大生产时,往往面临销售的困难。“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销路是困难的……报酬递增的倾向发生强烈作用的许多商品,大体上总是特殊的产品;其中有些东西目的在于创造新欲望,或是在于以新方法来满足旧欲望。其中有些货品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嗜好,因而绝不会有很大的销路;有些则具有不易为人觉察的优点,只能慢慢地博得公众的欢迎”。^⑧所以,个别企业处于不断的盛衰过程中,因此不会出现垄断现象,即使出现,也是暂时的,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成为可能。

(三) 报酬递增与代表性企业

因为个别企业的状况是变动不居的,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一般现象,所以马歇尔认为研究的对象不能是个别企业,为此他构建了代表性企业这一分析工具。其定义是“已具有相当的历史和相当的成功,它是由正常的能力来经营的,它能正常地获得属于那个总生产量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⑨它不是现实中的企业,而是用来分析某产品所属产业的一般生产状况的一种理论建构,也可以视为是产业的缩影。马歇尔指出“为了要了解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在所说的工业与国家中,一般地已经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需要研究这种普通企业”。^⑩可见马歇尔所指的报酬递增是整体层面的,而非针对企业而言的。正因为分析的对象是代表性企业,所以它不否定个别企业的盛衰。因而对代表性企业的分析可以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兼容。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竞争

共存的关键。所以认为存在马歇尔冲突的说法是曲解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的结果。不仅如此,很多人还误以为马歇尔的理论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下面我们来澄清这种误解。

三、马歇尔的“竞争”概念

在古典经济学中,尽管对竞争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它始终是核心的概念。Eatwell(1987)认为“完全”竞争的特征,常常被不合理地等同于古典学派对竞争的讨论。还有很多人认为,既然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的理论也是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上文提到的认为在马歇尔体系化中存在马歇尔冲突的学者往往都持有这种观点。前已述及,施蒂格勒虽然承认马歇尔的理论基础并非完全竞争,但他认为,马歇尔对竞争概念的使用不符合完全竞争的定义,所以是该受批评的。这些无疑是对马歇尔的严重误读,是一种后视之见。其实,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作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完全竞争”,其内涵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本部分一方面梳理“完全竞争”内涵的发展,另一方面介绍马歇尔对竞争的理解。

(一) “完全竞争”内涵的发展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张自由放任。斯密笔下的竞争是现实的。在他那里,竞争是动态性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静止状态,也不是一种理想类型。斯密的《国富论》中并未出现“完全竞争”一词。西尼尔(1836)那里隐含着:在不存在资本和劳动在各种用途间转换的壁垒,而且信息是完全的条件下,竞争才是完全的。所以他强调了完全信息对于竞争的重要性。穆勒的竞争理论基本是承袭了斯密的传统。所以,古典经济学家并未给出严格的完全竞争的定义,他们更多地是对竞争进行一般的描述。古诺(1838)使用的是“无限竞争”的概念。他对“无限竞争”的刻画更多地是从生产者角度来展开的。他认为当竞争发展到极致(无限竞争)时,每个厂商的产量对总产量和边际总产量的影响很小,以至于从总产量中减去这部分产量,不会使商品的价格有任何可察觉的变化。这里似乎暗含厂商数目很多,且只是价格的接受者。杰文斯(1871)以买卖双方

在价格方面的完全信息为视角,对竞争进行了描述。瓦尔拉斯(1874)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以自由竞争为基本假设的。他指出“纯粹经济学本质上是在完全自由竞争制度假设下确定价格的理论”。^①他的自由竞争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企业可以根据盈亏自由地调整产量,二是指买卖双方可以竞相出价,自由地买进或卖出。在埃奇沃思(1881)那里隐含着完全竞争中存在大量的买卖者,交易双方完全理解所需的信息。在克拉克(1899)那里,也没有出现“完全竞争”一词。他认为竞争是一种“静态势力”,竞争使商品价格成为自然价格。他对竞争的描述隐含了只有要素完全自由地流动时,竞争才是完全的。他指出“(在静态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撇开一切动态势力,使劳动和资本具有绝对的流动性,并使竞争能够安全实现”。^②施蒂格勒(1987)指出“到1900年,完全竞争的所有要素均已落实,并日益成为后来经济理论的标准范式”。^③奈特(1921)明确提出了“完全竞争”的概念,他对完全竞争的论述最有影响,很接近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他指出了完全竞争的8个必要条件:在先天和后天的性格方面,社会成员都是正常的人;社会成员完全理性;人们有合法地按照自己的动机从事生产、交换和消费的自由;经济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不存在移动和改变东西的成本,且不存在交易成本;所有的买卖双方都知道彼此的出价,商品无限可分;无共谋行为;排除个人之间的相互掠夺;必须存在有效的分工和交换的动机。^④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的大发展,人们才渐渐对完全竞争的特征:市场上有无数的买者和卖者,产品完全同质,厂商完全自由地进入或退出行业,完全信息等达成了共识。阿罗和德布鲁(1954)运用现代数学工具对完全竞争进行了形式化的刻画,并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唯一性。在竞争理论演变为完全竞争理论的过程中,竞争的动态性、现实性转变成了完全竞争的静态性和抽象性,完全竞争的内涵已经将分工、报酬递增等动态性的问题排除。不过,正如以下的分析所表明的,马歇尔的竞争概念依然是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

(二)马歇尔的“竞争”概念

马歇尔对竞争的理解承继了斯密的传统,他将竞争理解为一种现实层面的,动态性的过程。

在《原理》中,“完全竞争”一词仅出现了四次。马歇尔指出“我们始终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行业的雇主,……并不具有多于事实上他们所特具的那种竞争能力,知识和竞争的自由”^⑤,可见这里隐含了不完全知识的假设。接下来,马歇尔明确指出,他的理论并非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我们并不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完全竞争要求完全掌握市场情况”,而大量的社会现实表明,这一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⑥“完全竞争”一词,另外两次出现在论述工资问题时的一个脚注中。在这一脚注中,“完全竞争”一词是以引文的形式出现的,是无关紧要的。在《原理》中所出现的19幅供求曲线图中,代表性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所以马歇尔认为即便是单个厂商,也有一定的市场势力,从而能够影响价格。在第五篇第12章第二节的脚注中,他指出“当我们考虑个别生产者时,我们必须以他的供给曲线和他自己的特殊市场的特殊需求曲线相配,而不是和广大市场上他的商品的一般需求曲线相配”。^⑦这一脚注启发了张伯伦,导致了垄断竞争理论的诞生。陈岱孙教授1922年到1926年在哈佛大学读硕士和博士期间,与张伯伦是同窗。1983年他说“记得张伯伦说他是从马歇尔的《原理》中的一个脚注得到启发的”。^⑧在马歇尔晚年的得意作品《产业与贸易》中,他也指出了垄断和竞争的相容性。“尽管垄断和自由竞争非常不同,但实际上两者是相互渗透的:在所有的竞争性行业中都有一些垄断成分;几乎在所有的垄断中……垄断势力持存的期限是不确定的,如果垄断者忽视竞争的直接和间接的可能性,垄断势力不久就会丧失殆尽”。^⑨Whitaker(1987)认为马歇尔的竞争概念与其说接近于现代的完全竞争概念,倒不如说更接近于后来的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概念,这是有道理的。

总之,完全竞争的内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马歇尔没有提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概念,他的理论不是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的,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竞争相容的另一关键所在。

四、规模经济与竞争关系的演变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来思考规模经济

和竞争之间关系的演变。区分如下两个层次的问题是必要的:

第一层次,立足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在这一层次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马歇尔冲突。由第二、三部分的分析可知:第一,在马歇尔那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就是报酬递增、组织的经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又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对于个别企业而言,存在对其内部规模经济的两种限制,即企业生命周期和销售上的困难,这使得内部规模经济不会无限膨胀,从而不会导致垄断。第二,由于马歇尔使用代表性企业这一工具旨在分析产业的一般现象,而不是某一特殊的企业,所以它除享有该产业内所有企业平均的内部经济外,还享有源自产业整体,甚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外部经济。因此代表性企业是马歇尔的伟大创新,它可以兼容个别企业的盛衰,又可以分析外部经济问题,而外部经济可以抑制垄断的产生。第三,马歇尔的立论基础并非完全竞争,在该意义上的竞争条件下,来自需求层面的限制使得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不能不限制地扩充产量,进而占据市场。以上三点保证了在马歇尔经济学中,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和竞争的相容性。所以,认为马歇尔的语境中存在规模经济与竞争的冲突的观点曲解了马歇尔的报酬递增、规模经济、竞争等概念的内涵。因而,如果所谓的马歇尔冲突指的是马歇尔语境中存在规模经济与竞争的冲突,这就必然是一个伪命题。

第二层次,立足于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这一层次上,规模经济、内部经济、报酬递增、垄断、完全竞争都有了清晰的定义。规模经济、内部经济都是对单个企业状况的一种描述。报酬递增概念转变成了规模报酬递增,是对企业生产函数的一种技术性刻画。竞争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寡头竞争、垄断竞争。在奈特(1921)等人对完全竞争的定义中,就已经将分工、报酬递增、规模经济等问题剔除了出去,因此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从定义上就是水火不容的。另外两者的冲突关系也可以简单地数理化的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因为价格并非企业的决策变量,所以企业的利润仅为产量的函数。令 $\pi = R(q) - C(q)$, 其中总收益 $R(q)$ 、总成本 $C(q)$ 都是产量 q 的函数。

最大化的一阶条件要求 $\frac{dR}{dq} = \frac{dC}{dq}$, 即 $MR = MC$; 二

阶条件要求 $\frac{\partial^2 R}{\partial q^2} < \frac{\partial^2 C}{\partial q^2}$ 。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下,由于企业面临水平的需求曲线,因此价格固定为常数 P , 所以 $MR = MC = P$, 边际收益的斜率为零。如果二阶条件要满足, 边际成本的斜率必须大于零。因此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且边际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同时, 由于完全竞争使得企业无超额利润, 所以平均成本必须等于价格, 即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的最低点相切。因此完全竞争要求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必须是 U 形的。而如果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 必然会导致垄断, 从而不能达到均衡。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下, 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是冲突的。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 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马歇尔之后的早期形式化阶段, 将报酬递增思想驱逐了出去。目前尽管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角落里会提到规模报酬递增, 但其内涵较之于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 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 所以即便是规模报酬递增仍是遭冷遇的。但必须指出, 这种困境在马歇尔那里是不存在的, 所谓的马歇尔冲突只是现阶段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这些狭隘的概念间的冲突, 也是一种经济学过度形式化以后造成的困境。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马歇尔经济学与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 一方面考察了在马歇尔的体系中报酬递增与竞争的内涵, 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在马歇尔的语境中两者是相容的关系这一结论。另一方面指出了马歇尔冲突实质上是后来的新古典体系中狭隘的概念间的冲突, 即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冲突。因此, 如果马歇尔冲突所指的是马歇尔的语境, 则该命题是一个伪命题; 如果针对的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中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冲突, 则有其合理性, 但如将此冲突冠之以“马歇尔”冲突则容易引起对马歇尔思想的严重误解。

理论上的模糊会在现实中的政策层面得到体

现,并误导现实,产生严重的危害。回到本文引言,在对马歇尔冲突作了如上的思考后,我们不禁对国企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一些质疑,至少是对市场失灵论而言。而对于国进民退等问题更应进行深入的反思。对政府而言,这对于减少政策失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不必对报酬递增抱之以会导致垄断的警惕态度,而应该对市场寄予更多信心,对市场竞争的力量给予更多的信任,并约束自身行为,避免对市场的侵害。这是重读马歇尔冲突的现实意义所在。

在理论层面上,重读马歇尔冲突可以为报酬递增思想的复兴提供启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兴起的报酬递增思想,几乎都可以视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框架内,对马歇尔报酬递增思想的一定程度的复兴。这种复兴,可视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马歇尔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质疑的一种当代回应。这些经济学家以各种新的数学工具,形式化了马歇尔思想中的某些部分,如外部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等。Ethier(1982), Helpman 和 Krugman(1985), Romer(1986), Lucas(1988) 以外部经济作为切入点,将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结合了起来,这一进路将外部经济对报酬递增的影响刻画了出来。Krugman(1979), Romer(1987, 1990) 将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在同一个框架中进行了分析,这主要得益于 1977 年的 D-S 模型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的开创性的形式化处理。这无疑更接近马歇尔的思想。尤其是 Romer, 他意识到了 1986 年的文章中,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在 1987 和 1990 年的模型中采用了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杨小凯(1998)内生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并认为内部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是可以兼容的。Milgrom 认为杨小凯模型中的专业化与价格接受行为的假定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专业化导致报酬递增,而价格接受行为则是完全竞争的典型特征,所以 Milgrom 的批评指出了杨小凯模型中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的矛盾,点明了只有不完全竞争与报酬递增才是相容的,而这一结论,马歇尔早就预见到了。

不仅如此,在均衡的范式之外,我们发现对于报酬递增的研究也是暗流涌动,如演化经济学、复

杂经济学的贡献,这不仅让我们想到了马歇尔对报酬递增的动态演化特性、经济学研究对象复杂性的强调,以及马歇尔对经济生物学解释报酬递增问题寄予的厚望。所以,当代经济学对于报酬递增、竞争的研究,无论是主流范式还是非主流范式,都可以与马歇尔形成呼应。究竟是在均衡的范式内,还是在其他的范式(如经济生物学)内来兼容报酬递增和竞争,这是马歇尔当年纠结的问题,经济学下一步的发展需要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回应。本文通过重读马歇尔冲突,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如下启发:一方面可以尝试在主流的范式内,在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来复兴报酬递增思想。另一方面,要扩展报酬递增的内涵,从整体角度来理解报酬递增,不过这要求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可行性进行反思。

不过马歇尔的理论并非没有缺点。例如他虽然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在于经济动力学,认为报酬递增等复杂的动态问题属于经济生物学的研究范畴,但他无奈的是,未能构建出系统的经济生物学框架,尽管在前文论及的报酬递增机制中,我们会看到他在这一进路上的一些尝试。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种无奈,使他的论述颇具矛盾性。这表现在,他虽然屡次强调静态分析方法脱离现实的局限性,却不断地尝试在静态的框架内来处理报酬递增等问题。马歇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发现了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隐藏在经济学中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他直面这一问题,努力为调和两者做了一些努力。所以他的理论是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该体系敞开着对于报酬递增、分工、动态演化等问题的门径。

注释:

① 郝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批评家,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他 1820 年出生于英国德贝一个反对国教的牧师家庭。1852 年,在 32 岁时,他提出了“适者生存”概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72、288、288、315、371、320、338、372、372 页。

⑪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6 页。

⑫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彭逸林等译,人民日报出版

社2010版,第40页。

⑬约翰·伊特维尔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陈代孙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页。

⑭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王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7页。

⑮⑯⑰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册)》,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5、235、147页。

⑱晏智杰:《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

⑲ Alfred Marshall (1923), *Industry and Trade*, Macmillan. pp. 257.

参考文献:

1. Allyn A. Young,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38, No. 152. Dec., 1928;527—542.
2. A. C. Pigou, "An Analysis of Supply", *Economic Journal*, Vol. 38, No. 150. 1928;238—257.
3. Alfred Marshall, *Industry and Trade*, Macmillan, 1923.
4. George J. Stigler, "Perfect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5, No. 1, Feb., 1957;1—17.
5. J. M. Clark, "Toward a Concept of Workable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0, No. 2, Part 1. 1940;241—256.
6. J. K. Whitaker (eds), *The early economic writings of Alfred Marshall, 1867—189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7. Piero Sraffa, "The Laws of Returns under Competitive Conditions", *Economic Journal*, Vol. 36, No. 144. 1926;535—550.

8. Robertson, Sraffa, Shove,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Firm", *Economic Journal*, Vol. 40, No. 157. 1930;79—116.

9. W. J. Baumol, "Contestable markets: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2, No. 1, 1982(Mar);1—15.

10. 古诺:《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陈尚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1.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彭逸林等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1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3.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王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 施蒂格勒:《产业组织》,王永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5.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 王瑶:《斯密定理和规模经济》,《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

17. 晏智杰:《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 杨小凯与保罗·米尔格罗姆的讨论, <http://wenku.baidu.com/view/0cfba892daef5ef7ba0d3c0f.html>.

19. 约翰·伊特维尔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3卷)》,陈代孙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责任编辑 董希望

(上接第61页) 25. Levine R. and S. Zervos, 1998,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3), pp. 537—558.

26. Lucas R. E.,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pp. 3—42.

27. Raddatz C., 2006, "Liquidity Needs and Vulnerability to Financial Underdevelop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0(3), pp. 677—722.

28. Rajan R. G. and L. Zingales, 1998,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3), pp. 559—586.

29. Rajan R. G. and L. Zingales, 2003,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9(1), pp. 5—50.

30. Robinson J., 1952,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Other Essays*, Published by MacMillan Press.

31. Rousseau P. L. and R. Sylla, 2003, "Financial Systems, Economic Growth, and Globalization", in *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s. by Bordo M. D., A. M. Taylor and J. G. Williamson, pp. 373—413.

32. Rousseau P. L. and P. Wachtel, 1998,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Fiv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0(4), 657—678.

33. Schumpeter J. A., 1911,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Published by Dunker & Humblot Pres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Opie R., 1934,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4. Wurgler J., 2000,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1—2), pp. 187—214.

责任编辑 董希望

ABSTRACTS

Strengthening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Ruling Party: Cor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4)

Tang Huangfe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Party reform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ternal factors are the direct cause of party reform, and external factors are the catalyst for party reform. China's economic society has made overall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uling environment of the CPC has demonstrated revolutionary chang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PC has steadily expanded social foundation,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institutionalized level of the inner-party governanc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all sorts of legitimacy resources, and improved its adaptability in th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rough ideology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ruling party is the core theme of China's party reform and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China's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rvived in the challenges, and developed in the adaptation, the ultimate goal of which is to consolidate the ruling foundation and enhance the ruling ability of the ruling party.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ruling party is the basic foothold of party adaptability, and the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will finally guide and promote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adaptabi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experi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niversity Culture: History, Present and Path (12)

Liao Ke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part from various realistic causes,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existing drawbacks of China's universities. China's ancient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rising out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was attached to a great unified central government of monarchial despotism and thus formed som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like government-orientation, centralized management and pragmatism. Since modern times, educators like Cai Yuanpei and Liang Qichao had gone through persistent explorations, drawn upon the experiences from western universities and reflected on the deep-rooted defect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before a set of ideas pertaining to university culture were formulated preliminarily. However, with drastic changes of soci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China's university culture had retraced the route of its traditional mode in a new form. Due to some special causes, there was no fundamental change brought 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has become an impediment to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emplate the tradi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o as to bring forth a radical reform of the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s of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niversity culture.

Key words: university cultur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pragmatism; transformation

The Rereading of Marshall Conflict: A Perspective from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24)

Zhang Ribo

(Research Center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and Zhejiang Develop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Zhejiang Committee of the CCP,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Marshall Confli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cale economy and competition, is a problem troubled the academia for a long time.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confliction exists be-

tween scale economy and competition in Marshall's system. By distinguish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rshall's economics and subsequen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proposi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Tracing the context of Marshall and examining the exact meaning of Marshall's "scale economy" and "competi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is no confliction between them. Marshall Conflict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confliction between the scale economy and perfect competition in neo-classical system. Marshall's handling of them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both the practic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

Key words: Marshall Conflict; perfect competition; scale economy; monopoly; increasing returns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as a Special Nature Law:
The Economic Thoughts and Significances of Francis Hutcheson** (32)

Wu Honglie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Zhejiang Radio & Television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 18th century, when the Scottis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ociety was transforming, Francis Hutcheson further developed the tradition of natural jurisprudence, combined moral philosophy and natural law, and vastly revised Pufendorf's economic thoughts tha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atural law, which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natural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proces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formation. His thinking about the economic problems like division of labor, demand and value had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thinking of Adam Smith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implied ethical thinking still has progress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Key words: Francis Hutcheson; nature law; political economics

Multi-dimensional Bidding Auction and Non-binding Bid (40)

Liu Chong¹, Li Xing²

(1. Guanghua Administration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Abstract: The paper set up an auction model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bidding to explain the non-binding pricing which is common in bidding auction. In the model, the bid of price and design are submitted by the bidders who have two-dimensional private information which is cost and productivity. The auctioneer evaluates the bid using a scoring function. Payment is determined in a bargaining stage after the auction, so that price bidding is not executed, and thus non-bin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design bidding, price bidding and scoring function under balanced state even in non-binding bid. Furthermore, the model provides two verifiable assumptions. One is the most optimal design bidding is rising along with the rising of productivity while cost has two opposite effects on design bidding. The other is that better design can always have more chances for bidders to obtain contracts while cheap price is not the case. Finally, the paper illustrated the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model and the most optimal auction design, and compared the two model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Key words: non-binding bid; procurement auction; scoring auction

Financing Dependenc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es (50)

Gui Binwei¹, Xu Guangdong¹, Chen Yufeng²

(1. Research Center of Law and Economic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9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d and extended the methodology developed by Rajan and Zingales (1998), confirmed the financing dependenc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data of financial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s thirty provinces from 2001 to